

汪耀楠 著

詞典學研究

四川辞书出版社

汪

耀

楠

著

詞典學研究

潛齋



四川辭書出版社

责任编辑：诸定耕
封面设计：梅定开
技术设计：周世清

词典学研究

汪耀楠 著

出版：四川辞书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三号
发行：四川省新华书店
印刷：自贡新华印刷厂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版次：1990年9月第一版
1990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1.125 字数：240千
印数：1—1,000册

ISBN7-80543-063-2/H·33

定价：3.85元

《词典学研究》序

文字是人类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重要手段。历史上人类的文明，科学文化的发明创造和发展，依靠文字进行记载和传播。现在，人们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古代历史，是离不开古代文字的研究的。

我国古文字的产生，距今不下四千年，是世界上产生文字最早的国家之一。现代发现的甲骨文，书刻在龟甲上和兽骨上的文字，已经是我国古代成熟的文字。早在二千年以前，我国就有人研究文字，并且有了辞书。这些辞书，对文字的演变进行阐释，对词义和名物进行讲解。我国历代都有研究语言文字的词典和要籍出现。这些典籍数量之多，卷帙之繁，堪称世界之冠。

新中国成立以前，从辛亥革命到全国解放，前人也编了不少辞书，为我国语言文字学作出了贡献。重要的，如《中华大字典》、《辞源》和《辞海》等的出版，在国内和国外，都有较大影响。在此期间，还出版了许多文字考据著作和各种语文词典，对语言文字的研究作出了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三十八年来，文字研究和语文词典的出版，更是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是堪称浩劫的“文化大革

命”的十年，给词典的编撰蒙上了阴影。直到现在，这种极左思潮的影响，在一些词典中还没有彻底清除。

近数年来，词典的编撰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词典的出版，重点的、部头大的，除了《辞海》修订本以外，又出版了《辞源》修订本。《辞海》和《辞源》的所谓修订，实际上都是重新编撰。这两部篇幅巨大的词书出版以后，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词典的编撰工作进展得很快，1986年10月和11月，又分别出版了《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第一卷。这两部大字典词典的出版，可以说是语言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文化出版事业上的一件大事。两部大字典和词典，既反映了当代学者对汉语文字的研究成果，又记载了历史上的成就，为未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汉语大字典》着重于字形、注音和字义的研究。字形，反映了汉字形体在历史上各阶段的演变，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一直到楷书的变迁，都作了解释。注音，反映了古代至现代声韵的变化。字义，依据历史的典籍，作了详尽的剖析。《汉语大字典》既汲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反映了当代学者的观点。《汉语大字典》编撰十余年，湖北、四川两省的语言学者，进行了大量工作。这两省动员了有关大专院校的许多语言文字学教师进行工作，可以说史无前例。

汪耀楠同志参加了《汉语大字典》的编撰工作，为编撰的中坚分子。他是编委会的成员，为大字典从条目的编撰到审定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大字典编撰过程中，汪耀楠同志对词典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撰写了不少论文。其中，有关于我国汉语辞书的发展，辞书、类书的特征，词

典分类学，辞书释义的历史性和科学性等理论方面的论文，还撰写了有关训诂思想和方法，以及针对历史上一些重要词书典籍进行评论的论文。许多论文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他的学术论著，对于今后词典的编撰、辞书训诂典籍的研究和词典学理论建设将起着积极的作用。这种理论研究应予提倡。

我国漫长的文明历史，给我们留下丰富的遗产。我们对汉语文字的研究，是对我国文化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语辞书的编撰，是研究工作的概括与综合。现在，我国经济欣欣向荣，学术研究空气浓厚，出版工作日益繁荣，我国辞书的编撰和汉语文字的研究，将会进一步取得新的成就。

许力以

1987.10.

目 录

《词典学研究》序..... 许力以	1
论汪耀楠的《词典学研究》..... (民主德国) ILSE KARL	1
多义词义项的概括与区分.....	11
大型语文词典释义的特点和要求.....	21
“义项分合”说质疑.....	32
试论大型字书释义的历史性和科学性.....	42
大型辞书注疏材料的运用.....	60
大型辞书引例略说.....	72
名物字的正名与异名问题.....	83
相关条目解释的平衡与统一.....	93
通假问题.....	101
论词典分类.....	134
试论王力的词典学思想.....	144
王念孙、王引之训诂思想和方法的探讨.....	165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的假借理论和实践.....	183
转注研究的研究.....	198
《说文解字》的产生及其由来.....	216

纂集派训诂著作《经籍纂诂》	226
评《中文大辞典》单字释义	236
评《汉语成语大词典》	246
《词典学概论》读后	255
《汉语大字典》对清以来训诂成果的利用	263
从《汉语大字典》的编纂看我国辞书事业的发展	270
《汉语大字典》的编纂对词典学理论的贡献	285
《本草纲目》的辞书特征	313
“龙颜大怒”与校勘	322
——读《四库全书总目》“圣俞”有感	
ILSE KARL的《词义的限定》	333
后记	347

论汪耀楠的《词典学研究》

最近十年，对辞书编纂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讨论获得了迅速发展，包括单语词典学和双语词典学在内。一方面，在一系列欧洲国家所作的极大努力证明了这点，如：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中央语言学研究所于一九八二年十月在柏林市召开一次课题为“现代词汇研究的问题”的工作会议，是在外国学者参加的情况下举行的。（会议报告都发表在本所《语言学研究》杂志第一〇九号上。）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要出版一本分成二卷的《国际词典学手册》，按计划收有各个国家专家的一共三三三篇论文。

每隔一定时间，举行哥本哈根的国际词典学会议和欧洲词典学协会召开的会议。

在这些国家发表了无数的关于单双语词典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专著和论文。

这里我特别想着重指出，在苏联近几十年对该课题连续地进行的研究工作。例如，苏联词典学名家施切尔巴（Сčerba）四十年代早已创立每双语言要有两对双语词典的学说（这就是一对所谓外向词典，一对所谓内向词典），甚至今天许多

词典学家也赞成这个观点。维·沃尔斯基(Werner Wolki, 联邦德国)把苏联的一系列有意义的词典学理论论文的德文翻译摘要发表在《苏俄词典学的观点》一书上(出版于一九八二年,在蒂宾根)。由于他值得感谢的主动,就把一部分苏联词典学研究工作的结果介绍到西欧来,使西欧词典学界更广泛地熟悉了该国学者的成就。

在词典学领域里,西欧和苏联互相交流还不够的原因,无疑地在于“语言障碍”。欧洲和中国之间有类似的情况:因为有“语言障碍”,所以双方的词典学研究大体上还是分别进行的。

另一方面,对中国来说,可以明确指出,从七十年代末开始不只是编纂辞书的工作得到了新的发展,理论性讨论也全面地开展了。(从本论文集上获知,中国词典学历史是多么长而丰富。)中国词典学上的新高潮是在编纂《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的基础上形成的,专业杂志,如《辞书研究》、《词典研究丛刊》等等,一本接着一本地在各地出版。这些专业杂志,作为词典学家的重要学术论坛,促进了词典学的发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不少词典学家,几年以来连续地对辞书理论和实践发表意见,汪耀楠是其中之一。他参加修订和完善《汉语大字典》的编写方案工作,并且积极地插手这项讨论。汪先生写了许多关于编纂辞书各类问题的论文,甚至可以说,他差不多探讨了各个在编写过程中应该解决的重要问题。他所写的论文都收集到本书中。如果我研究汪耀楠所提出的一切问题、观点、建议、具体的例子,恐怕就会超出评论的范围。因此,只限于最一般的问题以及汪著作中在

我看来极有价值的观点。

汪耀楠的论文证明他对题材的深入认识。他详尽研究中国词典学历史的文献和书籍并批判地吸收其中的知识，包括古代、现代的辞书论述和工具书在内。就我所知，从本论文集目录上可以看出，汪先生选择的正是词典学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论著。在给予评价时，他坚持从马列立场来深入分析前辈的观点，采纳他们的正确结论，有根据地叙述自己对一本大字典的想象，总之，是以过去和现在的辞书实践为借鉴来进行理论研究的。

历史性和科学性是辩证的统一。这种认识给他的著作打上印记。字典的历史性不仅应从字义及释义来看，像在《试论大型字书释义的历史性和科学性》中令人信服地阐述的一样，而且还应从字典的全部历史发展来判断，就是说，从它的产生、发展阶段等获得对过去的字典的长短处和将来的字典面貌的认识。那么，历史性就可以在一部辞书的各个组成部分中表现出来。正如论题所标示的，作者以释义为中心，说明了他自己对大型字书历史性的观点。

作为词典学范畴的释义以及和字、词素、词的多义性有关的义项，毫无疑问是词典学的两项基本问题。有理由认为，汪耀楠的著作对这两个基本问题的研究起了卓越的作用，因此我就要更详细地说说这篇论文的内容。

汪先生解释释义的历史性说，“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文字的语义现象，从本义，引申义到假借义，对字的语义进行全面的总结。”他继续讲，“历史性在字义方面的

要求，首先是义项的完备。”这个要求不仅对大型字书是正确的，对大、中型词典也有效。对在分析和概括语义的过程中，“要克服感性上的主观因素”的判断，我同样表示同意。例句和注疏作为辞书材料的基础，在它的选择和运用中如何使历史性和科学性紧密地结合起来，该文也进行了充分论证。

历史性和科学性也包括语言和辞书的性质问题在内。这点，汪耀楠在《试论王力的词典学思想》中作了探讨。他赞成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所以“作为语言工具书的语文词典，也没有阶级性”的看法。在另一处他当然必须承认，阶级影响到语言。（参看《大型辞书引例略说》）我认为，这个问题复杂得多。当然，语言按其基本特征是“人所共有的”，就这点来说是“全人类的属性”。语言的语义内容以及语音和书面的表现形式总是特殊的，即受具体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因此，语义内容和存在形式不是不依赖阶级斗争的〔参看维·诺伊曼（Werner Neumann）等《语言学的理论问题》第二卷，柏林，730页〕一个语言的语义体系所以能够表示出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这点特别从政治性词汇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项事实在词典中得到反映，而怎样反映还是和编纂者有关系的。连语文词典归根结底也不会是阶级中性的，《现代德语词典》一书（科学院出版社，柏林，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七年）和《简明现代德语词典》一书（科学院出版社，柏林，一九八四年）证明这一点（参看两部词典的前言，特别是《现代德语词典》第三卷。）这两部词典的前言透彻地解释编纂者对词典施加的重要影响，这也是词典历史性的一方面。

无论汪耀楠从哪方面对编纂辞书的问题加以阐明，释义、义项和一词多义差不多在他的多数论文中起主要或次要作用。释义和义项是词典学理论的中心概念，在词典学实践中必须付诸实施。这项工作需要研究解决一系列问题，例如，多义词词义的划分（参看《“义项分合”说质疑》、《多义词义项的概括与区分》、《纂集派训诂著作〈经籍要诂〉》、《〈词典学概论〉谈后》），注疏材料的运用（参看《大型辞书注疏材料的运用》），例句的引用（参看《大型辞书引例略说》），用词的规范化——整理异名、确定正名是产生新词汇有关的一项重要、经常的任务（参看《名物字的正名与异名问题》），同类条目的同一组成（参看《相关条目解释的平衡与统一》）。

在中国专业文献中，从不同方面给义项概念下定义仍在研讨中。这里只想举两种相反的观点：（1）义项仅是辞书范畴，即辞书中多义词的分义；（2）义项是和辞书无关的最小语词义单位。汪耀楠着手研究辞书编纂历史上关于义项本质的观点时驳斥“义项分合”的说法，并且对辞书上怎么处理词的多义的自己看法提出根据。他认为，一词多义只是辞书上的现象，在具体言语环境中只有现实化的单一词义，多义的划分程度取决于词典的规模及种类。（参看《试论王力的词典学思想》）

虽然在实践中已经使用义项，但是至今还没有给义项下最后的定义。在这种情况下，汪耀楠建议，把以下的三个方面作为限定义项的基础：“1. 义项是多义词意义单位的分项，

……2.分项的意义是理性的、固定的，具有相对独立性；3.义项是按照语言（词义）发展规律划分的。”（《“义项分合”说质疑》）他还说，在词典中的义项到底不是别的而是编纂者所确定的，因为义项是从文献用例中提炼和归纳的产物，又是按照词典的篇幅和类型从全部义项中选择的结果。汪先生没有明确地说明自己的语义观点，就我看来，他在这点上与我国大部分语言学家意见基本上一致：语义是客观现实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是用语言表现出来，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仅仅通过研究才能够发现。

汪耀楠提出关于义项的上述三点，还值得继续讨论。

1. 多义词义项（或意义单位）确实确实光是在词典上存在吗？我认为，要分清作为内心词库（mental lexicon）组成部分的多义词词义单位（我就这种课题已在进行研究）和作为词典学概念的义项，虽然两者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承认义项是从属单位，使它取决于辞书的篇幅，那么，怎么解释语义的客观基础和义项与在人的头脑里所贮存反映客观现实的语义单位的关系？

2. 语言（词义）发展规律不是划分义项的唯一原则，特别是同期性辞书义项也可以按照意义单位的一般性限定和排列。

3. 再得考虑有没有使义项概括程度客观化的标准。根据我个人的看法，所谓客观化的标准就是从整个词汇体系及其中存在的内部语义联系中找出来的标准。〔对此，我提出些意见和建议，参看艾·阿格里科拉（Erhard Agricola）等《论词汇的微观、中观、宏观语义结构的综合性词典（简称“综合书”）》，第一章，载《语言学论文》，柏林（在印

刷)」。原则上汪先生认清了这一点,他毕竟指出,不能随意地确立义项。就此而言他也接受新颖的想法,如“在意义联系最薄弱的地方划分义项”这样划分义项的出发点就是“多义词的各个意义的‘连续过度性质’、‘相对独立性’”(《〈词典学概论〉读后》)他慎重地宣布它为许多方法中的一个,自己对此有别的看法,在《多义词义项的概括与区分》一文中详尽地作了论述。

汪耀楠对解决划分义项的问题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他建议从对词典学与语义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的关系的研究中去发掘一些建立义项的原则,使编纂者能有所依循。为此他提出:1.把握词义发展的内部规律,从词义的引申方式中去概括、区分义项;2.了解词的语法修辞特征,从词义变化的途径中去概括区分义项。他认为,凡词所表示的概念发生了变化,词性改变而造成词义改变,词性不变而运用范围、结合对象改变造成词义变化,修辞用法形成了固定的修辞义,词素义发生了变异,都应当据以建立义项。

他还要求,大型字典应该运用注疏材料作为义项的书证,注疏要证明而且说明义项,特别是说明疑难的。古典训诂学对此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参看《大型辞书注疏材料的运用》)。另外,他认为,援引例句,提供在具体语境下怎么运用的补充信息作为义项的证据很重要,提出了三条原则:

“一是用法的典范性,二是例句的多样性,三是例句的思想性”(《大型辞书引例略说》)。在辞书中引用例句的思想性是使辞书是其时代的产物,反映时代主导思想和社会需要的重要因素。释义和例句是一个统一体,是一件事的两方面,义项的准确性在于两者的一致(同上)。

编纂辞书的重要方面之一是方法性问题。虽然在本评论中这一点放到最后讲，但却是一项会影响辞书质量高底的工作。汪耀楠重视编纂方法，在《相关条目解释的平衡问题》一论中所提出的同类条目的解释一致的要求，对此叙述了原则。很遗憾，许多词典没有注意这点或停留在开始阶段。相比之下，我所的几个词典编纂组竭力争取满足这个要求，如《德俄词典》（第一卷一九八三年、第二、三卷一九八四年出版）、《汉德词典》二卷（一九八五年出版）、《简明现代德语词典》二卷（一九八四年出版）。

再有在辞书中怎样排列条目的问题。从表面上好象是辞书形式，但也含有根本的内容问题。一般来说，有三种经常实现的次序，即语音、语形（文字）、语义次序。以印欧语词典而言，音序编排法和形序编排法基本上没有差别，因为其文字是音素文字。义序编排法的词典有同义词典、反义词典、意海（义族词典）等等。

因为印欧语语言文字是音素文字，关于这点谈论什么形序编排法没有多大意思。但是，对使用汉字或类似汉字的语言文字词典字典来说，形序编排法起重要作用。常见的就是根据汉字偏旁而排列的辞书。在《〈说文解字〉的产生及其由来》一论中，汪耀楠曾就这个问题加以探讨。除了部首编排以外，还有别的字形次序，都有其利弊。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般的汉语语文词典，不论单语、双语词典，都是以所谓字头编排的，就是每个汉字作为字头条目，下边安排的是以该字为领头字的合成词，比如《现代汉语词典》。到今天对这

种编排法的研究还不充分。这个排列法不是纯音序的，也不是纯形序或纯义序的，其实是这三个要素的结合。字头条目的义项，都是字义义项，不分字作为词和字作为词素的意义区别却值得讨论。除了上面讲的以外，字、词典的形式的拟订，还有其他方面，这里不谈了。

汪耀楠的全部著作表明他的努力，在批判地利用中国词典学文献和工具书的基础上，对词典学理论和原则以及关于编纂辞书的设想作新的判断。辞书不仅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而且首先还有传统的一面。在尝试找出词典学的新方法和途径时，应该不断地解决创新和传统的矛盾。汪先生意识到传统，但总是不离自己的学科，即还未利用相邻学科所提供的可以促进词典学发展的研究成果，这也许是会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不过在划定的范围之内，他的论著是相当大的而值得介绍给国外的成绩。他虽然没有谈到词典学理论和实践的所有问题，（这是个别的词典学家一生也不可能作到的），但为词典学的进一步发展添了砖加了瓦。

值得探讨的问题很多，例如：一部汉字字典本来该说明一个汉字的词汇性质。讲字义，但不讲字在语言上的功能，似乎缺少什么。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字和词的关系变化很大，至今，汉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地失去了其“词汇独立性”，大部分已或是词素或是词兼词素。这个现象在字典中应当怎样反映呢？

另外值得研究的是词典种类、辞书使用者和辞书结构及编排的关系。在使用者——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范围內可进行的调查研究至今只不过是愿望。

第三点涉及以上已经提出的意见。词典学该采纳和应用